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演进

——兼论其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影响

吴 伟 夏 小 婷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我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迅速发展,全国上下纷纷投身其中。该运动以其历时之久、歌咏团队之众、影响地区之广、受众面之大而闻名,成为我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深入总结,重新认识其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影响,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提供助力。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演进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研究法,旨在从最深层次分析三个发展阶段救亡歌咏运动如何影响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民众感知及行为。概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兴起原因及发展过程;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本质出发,结合社会学视野和音乐美学角度,提出该运动主要通过情绪感染、认知涵化、行动发生三个步骤影响民众行为;以新时代抗战音乐文化的价值转化为切入点,阐述如何激活抗战音乐所蕴含的抗战精神遗产,使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持续滋养民众的爱国信仰、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民族意识;大众认知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4-0138-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413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与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地反映了音乐艺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凸显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社会文艺活动对民族情绪与集体意识的能动改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及发展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抗日救亡歌咏是民族危机与文化自觉的双重产物。

一、问题的提出及学术研究进展

目前,学术界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研究已取得多层次、多样化的成果,但大多集中于特定区域的歌咏运动或特定团体的歌咏活动,从社会学视角、音乐美学角度以及历史研究方法入手,深入阐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如何影响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研究较为少见。笔者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共获得154条相关结果,其中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论文检索记录为56条。现有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聚焦于特定区域的歌咏运动。多数学者选择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阐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该地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李方元提出,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地区,若想通过歌咏方式宣传和传播救亡意识,传播策略需具备以下特点:一是依托群众性歌咏活动进行传播;二是歌咏运动的目标群体须为广大

收稿日期:2025-04-30

作者简介:吴伟,男,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抗战大后方音乐、红色音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大后方红色音乐史料整理与研究”(21BDJ090)。

民众;三是歌咏内容须为抗日救亡歌曲;四是以组织为核心推动歌咏运动;五是通过广场露天形式进行传播;六是歌咏运动需依赖社会各界的投入与参与。其观点融合了传播学理论,从新颖的角度切入,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思路^[1]。阎方正指出,香港地区的革命歌咏运动是内地新音乐风尚的延续与发展^[2]。类似研究还包括林路^[3]和王小昆^[4]等人的系列文章。这些研究为后续探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均局限于特定区域的详细论述,未能跳出地域限制进行整体性研究。

其次,聚焦于特定团体的歌咏活动研究。一方面,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某些社团和组织,如关心系统挖掘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档案,在介绍这一特殊歌咏团体的同时,还提出了抗战动员中常被忽视的“技术—情感”双轨机制,凸显了抗战中常被忽视的民间自组织力量对现代国家建构的贡献^[5]。吴云峰、方春生等学者则将研究视角转向军队,全面探讨新四军中的音乐运动,认为新四军歌咏运动是以音乐为战斗载体的军事政治实践,通过本土化、即时性、全民化的艺术动员,实现精神战斗力与军事战斗力的同频共振,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6]。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针对特定人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如魏艳等将研究视角从团体转向单个人物,论证了个人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影响力,提出吕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组织—创作—理论”三维联动,将救亡歌咏运动转化为具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声音政治动员^[7]。以上研究将视角从特定区域转向特定团体或人物,从更细微的角度探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并揭示这些团体或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力,但仍未从更深层次视野出发,探寻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对民众产生影响的根源。

再次,聚焦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音乐本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特定歌曲进行深入探讨,阐释其内涵。例如,祖振声详细分析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认为抗战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创新性,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8]。曹玲玉则指出,音乐的爱国主义主题随抗战阶段的变化而演进,抗日救亡歌曲中不断升华的抗战精神逐渐超越了艺术审美,将反侵略斗争升华为民族道德共识,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联结,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因^[9]。二是针对特定音乐形式的研究。如石一冰以抗战时期的延安合唱运动(1935—1945年)为切入点,提出该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首次合唱高潮,并强调合唱作为“唤醒、教育、组织民众”的政治工具,通过集体歌唱形式,有效强化了民族抗战的意志^[10]。以上研究均从音乐本体出发,阐述了不同时期抗战音乐所体现的独特精神和情感表达,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抗战大后方的相关研究。抗战大后方音乐不仅是近现代音乐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与民族复兴重大转折时期音乐文化变革与转型的重要产物,更是维护人类和平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例如,汤斯惟^[11-12]从多个角度深入探究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贡献,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蒲方提出了音乐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功能,认为近代“新音乐”在动员民众、改良社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其现实主义精神与大众化路径对当代音乐创作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13]。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在探讨抗日救亡歌咏音乐方面,已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若能引入社会学的视角、音乐美学的维度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对民众情感、认知及行为的深远影响,将为学界提供一个全新维度,以理解民众情感思维与传播行为的动态变化。通过考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形成结构和传播体系,揭示其在历史关键时刻如何成为强大的意志载体,如何跨越文化与政治的界限,达到影响人们情感和行为的目的是,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音乐与情感关系的认识。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拟从社会学视角和历史研究方法出发,不仅考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本身的发展与传播,还将探讨其如何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如何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引导公众行为等问题,并力图在更广阔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探寻答案。

从音乐美学的角度看,音乐的感性特质使得音乐具备“移情”“共情”的功能,这也是音乐塑造人的

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先决条件。音乐通过影响听者的情感,能够引导和改变其观念与行为,使政治动员功能得以实现。而政治动员实质上是一种行为的塑造,音乐以感性机制促使人在思维上进行理性转化,进一步影响行为的改变。歌咏运动作为新音乐运动的一环,其表现形式、音乐内涵、社会功能等与新音乐运动几乎一致。

抗战时期民族情绪是集体情感的体现,抗日救亡歌咏所构建的民族符号将个体情感的情动转化为更大范围的集体情感,从而集聚社会力量。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抗战时期以音乐实现社会团结的特定文化现象,通过音乐的感性特质让人产生情感认同,通过不同的音乐符号统一认知,最终促发个人的行动参与。简言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抗战时期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大致是:情绪感染—认知涵化—行动发生。

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三个阶段

萧友梅曾在《音乐的势力》一文中提到:“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14]596} 抗战期间,群众歌咏影响民众情绪、认知与行为的现象值得深思。音乐具备独特的感性特质,如黄自在《音乐与人生》一文中所说:“音乐的重要原素有谐和,有节奏……所以集大众于一堂……要是同唱一首歌,或听一个大家熟悉的曲子,内心定会同感而起共鸣,成水乳交融之象;更因节奏的影响,步趋举动也容易整齐一致。若果感到团体精神的涣散,行为的分歧,能借音乐来予以适当的训练,必然得收可观的效果。”^{[15]131}“新音乐”的出现为抗战时期凝聚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等提供了新的途径,集体歌咏这一音乐形式更是具备天然的优势。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生发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本文着眼于抗战语境下的社会感知,以各地的抗战歌咏活动的时间、历史事件、抗战文艺政策等因素为参考,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划分为以上海为中心、以武汉为中心、以抗战大后方与延安为中心的三个阶段。

(一)救亡先声:以上海为中心的歌咏热潮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国立音专”在上海建立。依托专业院校的音乐人才及相关音乐资源,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在上海频繁开展社会活动,使上海具备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抗战期间,活跃在上海的还有聂耳、任光、张曙、吕骥等深受左翼革命文化熏陶的音乐家,这些音乐家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创作者和活动组织者。另外,上海也是我国近代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抗战爆发前夕,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6]。高度发达的出版业在抗日救亡歌曲刊印及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情况,上海具备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土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音专师生迅速成立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抗日救国会”,创作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歌曲,如黄自创作的《抗敌歌》。1933年,以任光、吕骥、聂耳为首的左翼音乐家们在上海广泛开展活动,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音乐研究文论,依托上海先进的制片业和音乐出版业,积极为进步影片编配主题曲,创作了《渔光曲》《毕业歌》《前进歌》等优秀作品。上海逐步成为辐射全国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心^[17]。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被迫转移。

(二)承上启下:武汉歌咏热潮的爆发与落幕

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也云集武汉,武汉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城市。1937—1938年间,武汉歌咏团体众多,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等专门歌咏组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极为频繁、规模盛大。其中,1938年4月7日举办的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水陆火炬歌咏大游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之一。此次歌咏活动中,武汉的学校、工厂和各大歌咏团等都积极响应,约有十万人参与其中^{[18]31}。

武汉的抗日歌咏活动相较上海时期更为炽烈,此时中华民族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各界人士对倭寇更有切肤之痛。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至抗战大后方与延安等地。

(三) 转战后方:抗战大后方与延安歌咏活动全面铺开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城市,这里集中了大量专业音乐机构和组织,如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和中国音乐学会、重庆救亡歌咏协会等。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十分频繁,出现了“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等盛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抗战大后方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音乐期刊,为传播抗日歌曲、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庆创办了《新音乐》(月刊),以音乐为载体在抗战大后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推动“新音乐运动”发展,凝聚了民众的抗战意志和爱国热情^[19]。

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歌咏活动一直比较丰富。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歌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延安地区的歌咏活动除贯彻抗日救亡这一主题以外,还侧重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充满民族性和战斗性。在延安地区从事歌咏活动的音乐家主要以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为主,例如向隅、吕骥、马可、贺绿汀等人。活跃在延安地区的音乐家和活跃在抗战大后方的音乐家存在一定的交叠,例如贺绿汀就是1943年从重庆前往延安。延安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鲁艺实施的“来去自由”政策吸引了不少爱国音乐家。

抗战大后方和延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继上海、武汉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始于1938年武汉沦陷,终于1945年日本投降。

三、抗日救亡歌咏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多维影响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通过组织歌咏活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凝聚民族力量、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其实现过程实质上就是救亡歌咏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首先,通过编配旋律、节奏等音乐文本以及歌词引发受众对歌曲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唤醒受众,产生民族抗争情绪。例如,对侵略者的仇恨之情、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对抗战胜利的期盼之情、保家护国的热血之情。其次,音乐作为文化产物,具备与文学、电影、戏剧等其他文化产物相同的特性,通过构建特定的文化框架塑造受众的认知。第三,在情绪影响与认知塑造取得直观的效果后,受众的行为得到涵化,救亡歌咏对人的行为影响由此完成。以此为逻辑,抗日救亡歌咏在抗战时期对民族情绪、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折射出的命题便是: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情感?建立什么样的认知?作出怎样的行动?

(一) 情绪感染:集体歌唱中的情绪共振机制

音乐不仅是人情感的外化,还能通过某种内在机制产生情感互动。这样的互动机制是如何建立的?以歌咏运动为例,它对音乐材料即旋律、节奏、歌词等进行符号编码并发挥了集体歌咏的群体性特征,通过设计仪式化的场景来调动受众的感官体验,从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共振。

1. 基于音乐材料的民族情感符号构建

音乐的材料包含音乐的旋律、节奏等元素,这种构成艺术的物质材料与一般的物质材料不同,它并不是作为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物质基础,而是作为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精神基础。音乐作品能对人的情感产生明确的影响,需要音乐作品中传递的音乐符号与接收者之间存在共通的意义空间,即受传者对符号有共同理解和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生活经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救亡音乐所承载的符号是贴近当时中国群众生活的、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即高度的大众化。因此,为了尽可能感染大众的情绪,使之产生情感共鸣,救亡音乐的感性符号里的“能指”与“所指”脱离了“唯艺术”叙事的晦涩与暖

昧,转面用喜怒言于表的旋律与节奏和近乎白描的词汇去表达社会现实。

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音乐材料的符号化构建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情感导向。无论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还是哀婉深情的抒情歌曲,其旋律、节奏、歌词等元素均被高度提炼为具有明确情感指向的符号系统。黄自《抗敌歌》通过附点节奏、和弦分解与轮唱形式,将“保家卫国”的集体意志转化为可感知的音响动力,使受众与演唱者能清晰感受到作品呼吁团结抗战的乐思,产生保家卫国、抵御侵略外敌的振奋之情。张寒晖《松花江上》则利用大跳旋律、调式对比与叙事性歌词,将个体悲怆升华为民族共同记忆。张曾向好友说起,《松花江上》是描绘东北同胞的悲伤,并借以激起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通过眼泪激发人们积极抗战。这些作品的成功在于其对音乐感性材料的运用,构建了一种十分具体的情感符号,以大众熟悉的民间音乐语汇、直白的文本表达和强烈的情感张力,去影响国人在民族危机下作出情感反射。

2. 群体式互动场域的构建与仪式化场景设计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观点认为:“产生互动仪式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拥有共同的关注焦点;需要分享共同的情绪或者情感体验……产生拥有成员身份的群体团结感;获得采取行动时自信、有力量与主动进取的个体情感能量;拥有代表群体的符号;产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道德感。”^{[20]86} 这一理论揭示了歌咏运动是如何通过音乐这一媒介来影响群众情绪的。在大型群体活动中,以集体歌咏为形式,让不同个体参与交流,情绪得到刺激,从而强化民族认同感,构建出利于情绪传递的场域。

情绪共情场域的构建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与基础。一是要有相当规模的人群才能达到较好的情绪共情效果;二是参与者进行情绪交流的载体需具有较强的感官调动作用。集体活动是链接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的主要手段,通过参与集体活动能加深个人的社会参与度,也能使社会意识更容易被个人接受,故大规模的歌咏活动对参与者的情绪影响十分深刻。各类歌咏大会或含有歌咏这一环节的集会具备天然的仪式特征。仪式能够在参与者的心理上产生某种作用,唤醒和激发参与者的某种情绪,进而使其承载的信仰或意义在这一情绪中更深刻地被参与者所体验^[21]。作为社会仪式的歌咏活动有劳军、纪念、哀悼、祝捷、献金等多个主题,歌咏活动的组织者能通过设计特定的仪式场景符号,将政治观念、社会心理、文化意涵等内容传达给群众,参与歌咏仪式的个人与群体则能通过这些仪式化的场景实现个人感知与社会感知的同步。

(二) 认知塑造:抗战音乐的多重文化框架构建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诞生的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它们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容易引起情感共鸣。当然,同一首音乐作品在不同人的身上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对其内涵的认知也有所差异。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自发初便紧紧围绕着“救亡”的语境展开,“语境”意味着人们可以在认知中创造一个整体、一个格式塔,这个整体或格式塔既意味着一个类别,又包含了与认知对象相关的其他事物。正是在“语境”中,人们才能理解或建构事物的意义^[22]。因此,如何用音乐去使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在认知上趋于一致,必然是歌咏工作组织者与音乐家们关注的重点。要使音乐的“救亡”功能可行,需要抗日救亡歌咏能在民众现有的认知框架中被理解与接受。“框架”是一套共享的认知前提,人们借助“框架”辨别外在可见符号的隐喻逻辑,进而超越感官刺激符号及其意指,达成对事物意义的理解^[23]。抗日救亡音乐构建了基于民族文化框架的叙事手法,使各阶层的群众能从中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同时发挥了音乐的教育功能。

1. 民族文化框架下的身份认同

抗日救亡歌曲关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整体”的话语表达,是对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摒弃,有助于国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整体认知,强化了各族民众休戚与共的意识^[24]。有学者指出,抵抗外敌需要动员全民族的集体力量,需要强化全体国民的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新的认同符号^[25]。抗日

救亡歌曲的创作通过整合民族文化元素,构建了超越地域、超越单一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符号。

抗日救亡歌曲在创作中积极吸收民族与民间音乐风格,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黄河大合唱》虽以北方民族音乐为基础,但其间穿插的《河边对口曲》采用陕北民歌对唱形式,模拟黄河两岸不同地域人民的对话,象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抗战。

《义勇军进行曲》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国家主权独立的执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更是强调民族命运共同体,必须万众一心共同抗战。此外,《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文化符号也塑造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将“血肉”与“长城”两个意象进行类比,生动地把个人、民族与抵御外敌的长城巧妙联系,唤起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将个人、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引导民众认识到家国一体、中华民族共命运。

2. 民主与科学框架下的认知浸润

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进步思想与革命理念通过抗战歌曲传播到城市与乡间,重塑了民众对战争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对科学的认知。例如歌曲《新女性》倡导妇女解放,其歌词“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论男女,世界大同”,直接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呼吁女性投身生产劳动,积极创造个人价值。歌曲《三月谣》的歌词:“三月里呀三月三,春风吹遍太行山。河水开呀麦苗长哪,天气和暖好耕田。多开荒呀多种麦,巩固边区好田园。有饭吃来有衣穿哪,自力更生不费难。小米香呀山芋甜,吃饱肚子上前线,打败鬼子保家园哪,自由幸福乐陶然。”歌曲鼓励人们积极生产,描绘了人们在阳春三月的季节里努力耕种,呈现了要用自己的双手提升自身生活水平,保家卫国的进步思想。总之,这些歌曲通过对地域性的民歌进行改造,使民众在歌唱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积极的、科学的、革命的认知。

(三) 行为动员:从情动到行动的社会效果实现

当艺术创作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时,便能超越审美范畴,成为重塑群体行为的重要力量。救亡歌咏不仅在抗战时期影响了民族情绪、认知,还进一步对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其关键在于创造了强大的“集体意识”生成场域。当民众在集体歌唱中形成节奏同步、情感共振时,个体意识会消融在群体氛围中,产生一种超越日常的“神圣性”体验。这种通过音乐仪式建构的情感共同体,使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等概念变得可感可知。抗日救亡歌曲通过构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命运共同体等民族音乐符号使人们的民族情感得以凝聚、社会认知得以再造,实现了从“家到国”的责任移植和从“民到军”的身份转变^[26]。歌咏活动通过周期性重复这种情感仪式,最终将抗战动员内化为参与者的身体记忆与行动自觉。

抗战时期许多歌曲直接以“参军”“上前线”“当兵”为主题,例如《丈夫去当兵》《当兵歌》《送郎上前线》《一同去投军》《送郎出征》《参加八路军》等。这些歌曲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促动人们积极参军,消除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陈腐观念。以音乐手段鼓励民众参军成为战时军事动员的重要手段^[27]¹⁶⁵,《晋察冀日报》曾登载《平山某村自卫队员全体报名》一文,真实记录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歌声中积极参军的景象:

在平山,河道冻得紧紧,人们脸上散发着红光,歌声和笑声比往日都响都高昂。全村老小都坐在广场上,土墙上贴着红条纸,写着响应聂司令员号召,自动参加志愿义务兵……主席刚刚报告完,中队头一个站起来,用手一招,粗壮有力的声音从他嘴里抛出来:参加义务兵,谁同我一块去报名。说完了,眼睛扫在自卫队员的身上,手在摇晃,热情的掌声不断引起山谷的回音。青年人全身的血液流得更快,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四十几个自卫队员涌上前,报名处的桌子也几乎被挤满了。^[28]

鼓励参军抗战的音乐作品,把责任感和荣誉感深植人心,建立了“保家卫国,人人有责”的社会认知,将“家庭—宗族”的传统伦理置换为“个人—国家”的现实责任,“保家”情感通过音乐仪式升华为

“卫国”的行动,进而让民众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

救亡歌咏对抗战时期人民行为的影响还体现为激发人民为抗战提供物资捐助方面。抗战期间,日寇实行“以战养战”策略,疯狂掠夺我国资源,同时对我方进行全面封锁,中国军队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因此,号召民众为抗战募捐、筹款也是抗战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做棉衣》《募寒衣》《缝棉衣》等歌曲以朴实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呼吁民众为前线将士提供物资支持。抗战期间,各类以募捐为主题的歌咏活动屡见不鲜。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曾带领音专的师生高唱《抗敌歌》,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上海民众纷纷响应。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的江定仙曾撰文回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记得他亲自带领我们到浦东为东北义勇军募捐。”^[29]《晋察冀日报》也报道过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筹款捐资的景象:“此间各地群众,现正狂歌反‘扫荡’的光辉胜利,胜利歌声正高扬于田陇间,群众的愉快心情可见一般……某村士绅赵靖忠,集资捐助民兵,购买枪支弹药。某村士绅捐洋百元,某村民众除自动捐出白面慰劳民兵外,并捐洋一千二百余元,作为建设村中经费。”^[30]救亡歌咏与募捐活动的耦合将人们的“情动”转化为“行动”,诉诸音乐符号的情感渲染与歌词文本中极富动员性的口号,使受众的社会道德感知与责任意识得到强化,人们自发地为抗战救亡提供物资支持与生产保障。当音乐成为道德情感的振荡器,经济行为便不再是计算,而升华为仪式。

四、新时代抗战音乐文化的价值转化

抗战音乐在烽火岁月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用,其历史功能与文化基因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创造性地传承与利用,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抗战音乐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声呐载体,其精神内核在于将艺术创作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结。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整个过程始终围绕“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使新音乐为时局服务、为抗战服务、为民族服务,大众化的音乐与歌唱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抗日救亡的内涵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与责任。当前,面对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使命,我们亟待思考:如何激活抗战音乐所蕴含的抗战精神遗产,使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持续滋养民众爱国信仰、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

在新时代语境下,抗战音乐文化的价值转化需突破“历史遗产”的静态定位。抗战音乐文化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家国情怀,可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共振。抗战音乐作品通过“音乐大众化”的实践,构建了“艺术为民族而战”的创作范式,体现了三重特性:战斗性(鼓舞抗争意志)、民族性(强化文化认同)、群众性(实现广泛传播),从而超越单纯的审美功能,成为战时社会动员的“精神武器”。例如,《黄河大合唱》中“风在吼,马在叫”的意象叙事,既是对民族危亡的即时回应,也暗含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哲学底蕴,可为当代主旋律创作提供借鉴。

抗战音乐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需要在保持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实现表达方式的创造性突破。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要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构其意义系统,使其既延续历史记忆的深刻性,又具备面向未来的开放性^[31]。其关键在于建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对话机制,在数智化时代的技术依托下,实现艺术语言的当代诠释、传播载体的多维拓展、接受方式的沉浸体验。例如在抗战主题纪念馆中增设沉浸式交互设备,演绎经典抗战合唱作品,使参观者能亲身参与抗战文化的互动体验。由身体在场性搭建过去与现在的“共情”桥梁,通过在场的互动将历史事实内化为个人情感。这种转化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启迪,最终实现从历史记忆到文化基因的升华,使抗战音乐文化成为流动的、生长的精神传统。

五、结 语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历经了上海为中心、武汉为中心、抗战大后方与延安歌咏活动三个阶段,深刻映

射出战时中国社会空间与文化生态的变迁轨迹。歌咏运动通过音乐这一特殊载体,在民族危亡之际构建起强大的情感联结与精神动员网络,其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音乐艺术在特定历史时期凝聚社会共识、传播抗争精神、推动民族觉醒的独特功能。从艺术本体来看,抗日救亡音乐通过对旋律、节奏、歌词文本等音乐感性材料的有机整合,形成了独特的情感共鸣结构。这种结构既能激发个体的情绪共鸣,又能引导集体的行为实践,使音乐超越单纯的审美范畴,成为战时社会动员的有效媒介。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抗战音乐文化的价值回溯仍有深化空间:其一,针对抗战音乐史的学术梳理,需在历史语境中把握其发展脉络,在现代视野下阐释其文化内涵;其二,应丰富抗战音乐的呈现方式,通过创新艺术语言与融合技术媒介,实现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统一。其三,要发挥学校音乐教育在新时代抗战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利用合唱展演、音乐剧表演等情境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增强对抗战历史的感受。通过学科融合的方式,开展红色音乐赏析、主题班会等活动,让抗战音乐与政治、历史联动,丰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路径,实现抗战音乐文化的代际传承。抗战音乐的传承与价值深化,终将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持续发挥其独特作用,通过艺术的力量传承历史记忆,凝聚民族精神。

[参 考 文 献]

- [1] 李方元. 抗战时期重庆抗战歌咏活动初论——兼及抗战歌咏的几个文化特征[J]. 音乐研究,1992(3):93-96.
- [2] 阎方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革命歌咏运动考述[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3(6):38-44.
- [3] 林路. 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救亡歌咏运动[J]. 黄钟.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0(4):3-6.
- [4] 王小昆. 壮声破敌奴肝胆——试论桂林抗战歌咏运动的特点与历史经验[J]. 黄钟(中国.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3):16-19.
- [5] 关心. 抗战歌咏:青年会的民众救亡动员[J]. 音乐研究,2015(3):28-38.
- [6] 吴云峰,方春生. 论新四军的音乐歌咏运动[J]. 人民音乐,2011(5):62-64.
- [7] 魏艳. 吕骥与救亡歌咏运动[J]. 人民音乐,2005(8):27-31.
- [8] 祖振声. 时代的心声 永恒的旋律——评抗日战争歌曲[J]. 音乐研究,1995(4):15-22.
- [9] 曹玲玉. 论抗战音乐作品中的爱国主题[J]. 伦理学研究,2014(3):123-129.
- [10] 石一冰.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延安合唱运动发展纪略(1935—1945)[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2):79-85.
- [11] 汤斯惟.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音乐探索,2023(2):3-12.
- [12] 汤斯惟.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论纲[J]. 中国音乐学,2024(2):101-110.
- [13] 蒲方. 对抗战音乐的再认识[J]. 人民音乐,1995(11):2-4.
- [14] 萧友梅. 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 [15] 黄自. 黄自遗作集(文论分册)[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 [16] 姚琦.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J]. 社会科学辑刊,2001(6):122-127.
- [17] 叶语. 烽烟万丈 战歌震天——漫话“陪都”抗战音乐[J]. 人民音乐,1995(12):12-16.
- [18] 李琪. 音乐抗战:武汉抗战时期歌咏活动研究(1937—1938)[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9.
- [19] 吴伟.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活动述论[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6-33.
- [20]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1] 张伟.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仪式化传播及其实践[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60-165.
- [22] 郝永华. 迈向一个认知科学视角的框架理论——重返并超越贝特森[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9):1-13.
- [23] 胡翼青,姚文苑. 作为背景的“框架”:媒介研究视角下的框架理论再诠释[J]. 新闻界,2023(7):44-54.
- [24] 闫丽娟,谢芝.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形象建构——以抗战歌曲为中心[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8):42-49+183.
- [25] 孔兆政. “中华民族”何以成为共同体[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20-27+181-182.

- [26] 郑茂平.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歌曲的情感体验方式[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15-26+219.
- [27] 牛崇辉. 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 [28] 平山某村自卫队员全体报名[N]. 晋察冀日报, 1942-03-04(3).
- [29] 江定仙. 纪念黄自先生[J]. 人民音乐, 1958(4):27-29+19.
- [30] 太行人民热烈欢呼祝捷, 纷纷慰劳部队民兵[N]. 晋察冀日报, 1943-06-04(3).
- [31] 张焱. 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伦理旨归[J]. 湖南社会科学, 2015(5):184-188.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ging Movemen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 Its Impact on National Sentiment, Cognition, and Behavior

Wu Wei Xia Xiaoting

(College of Music,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singing movement is a collective singing form with the masses as the main body and singing in unison as the main feature. It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arried out and participated artistic activities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1930s, China entered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anti 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songs developed rapidly. The whole country launched mass singing and salvation movements. This movement is famous for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istory that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with numerous singing teams, far-reaching regional influence, and wide audienc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Anti Japanese Salvation Song Move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ti Japanese activities, especially its impact on national emotions,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nti Japanese Salvation Song Movement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as the main approach.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hree time periods, the aim is to analyze from the deepest level how each stage of the Salvation Song Movement influenced the national spirit, public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is article first outlin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reasons for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nti Japanese Salvation Song Movement. Secondly, starting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Anti Japanese Salvation Song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nd music aesthetic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movement mainly influences people's behavior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emotional infection-cognitive assimilation-action occurrence.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anti Japanese war music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how to activate the anti Japanese war spirit heritage contained in anti Japanese war music, so that it can radiate new vit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continue to nourish the patriotic belief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Keywords: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singing movem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ublic awareness

[责任编辑:陈忻]